



“巨嘴鸟”学术之林

反叛

◎
程文超 著
路

程文超 著

中山大学出版社
·广州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反叛之路 / 程文超著. —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 1999.9
(“巨嘴鸟”学术之林)

ISBN 7-306-01580-X

I . 反… II . 程… III . 文化 - 研究 - 中国 IV . GL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6198 号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: 510275)

电话: 020-84111998、84037215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

(地址: 广东番禺市市桥环城西路 201 号 邮编: 511400 电话: 020-84881937)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195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自序

1993年7月13日一早，我与妻子乘坐的火车到了广州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南国的这片土地。一切都显得新鲜。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登上了203路汽车。随着汽车的启动，广州一步步向我们眼中走来。街道是狭小了些，摩托车却如蝗虫。路过一条水流，人们说，这就是珠江。哦，我应着。心里多少有些失望，它与我心中的“江”有些不相称。在中山大学南门外下了车。天上正下着雨。为躲雨，也为充饥，我们在路边小吃店吃了一碗面。天还早，人不多。雨在顶篷上叮叮咚咚地响着，衬出几分幽静。那场景，有点像50年代的电影。

一边吃着，我一边看着中山大学的校门，心里有些异样的跳动。东漂西流地过了三十多年，如今，我准备在这里扎一个安稳的“家”了。可是中大，你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
吃完面，雨也停了。我与妻穿过马路，走进中大。参天的古木静静地排在校园，树叶上雨点滴滴答答往下掉。不时有一蓬或几蓬青竹，火焰般地绿着。整个校园洗过一样，鲜明的、青青的、幽幽的。我与妻交换了一下眼光。不错，我说。真不错，妻说。

我们被安排在爪哇堂315号住下了。这是一间20平米

大小的房子。我们用一半作了卧室，里面放了两张床，我们的，和我们女儿的。一大一小，紧挨着。一块布帘，隔开另一个天地。在另一半的天地里，我放了一张书桌。书桌的左边，是一台 25 吋的彩电和一套音响，右边是几张沙发，沙发前面，也就是我的椅子后面，是一张小茶几。还有一块地方呢？堆书。书是打不开的。在北京时怎么搁着还怎么搁着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。于是，我的工作室、女儿的学习室、客厅、餐厅、储藏室，都有了。这个方寸天地是个真正的“多功能室”。一到晚上，我占着书桌看书写字，女儿在茶几上做作业，妻子还可以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。一家人，其乐也融融。对了，还有一个“功能”没介绍——蚊子的卡拉OK 厅。那里蚊子多。一到晚上，蚊子更是聚集在一起，一边放声高歌，一边把我们当点心吃着。我们有时点上蚊香，有时干脆钻进蚊帐里，与蚊子和平共处。

房子是小点，希望却在。（学校有关部门告诉我，这里只是过渡，等两个月后正式给我们分房。果然，等了六个“两个月”之后，我们搬家了。）而且，那真的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住处。现在，住在三室两厅的房子里，将那些“旧事”往电脑里敲时，我仍然很留恋我的爪哇堂 315 号。爪哇堂是一座红砖砌就的三层楼房，四周都是树，旁边便是中山大学中区的大草坪。一早，你打开窗户，涌进的空气很甜、很香。吃过晚饭，一家人走下楼来，在草坪周围散步。和风徐徐，一天的疲劳也就随风飘逝了。特别不能忘记的是 1993 年中秋节。那晚我们一家出外赏月。一下楼，全呆了——偌大的草坪上，满地的红灯笼啊！那灯笼，把青青的草苗、如水的月色全铺上了一层醉人的红。这画面来得太过突然，来得我们毫无准备，我们全被“镇”了。于是一家人全变成了

MAG 86 'OP

自序

小孩。迅速买了一个小灯笼，三个抢着玩儿。提着小灯笼，在大红灯笼中穿来穿去。很晚了还舍不得回家。以后每次下楼，眼前便出现青草地上那一片红。

我的窗外，是一棵龙眼树。平日，绿枝掩映，树影婆娑。结果实的时节就更好玩儿了。你看着它从一个个小蕾儿慢慢地长。第二天与前一天，似乎没什么变化，可隔几天一看，竟长大了一点儿。原来它是那么镇定，不慌不忙，却胸有成竹。渐渐地，真长大了，仍然是那么不起眼，丝毫没有张扬或招摇的意思。于是，你每天都忍不住要看它一眼。当它终于长成成熟的龙眼时，你简直觉得那是你的作品一般，是一个有你的感情投射的产品。

仔细想，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？你每天的观照、你的心血参与了它的成长？但它只是长它的，与你无关。你明白了，你有一种东西在与它一起成长。那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宁静、淡然的平常心。我想，人要做到龙眼那种神闲气定的样子，不容易，可你得学。人生，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。有了点艰难，这样的或那样的，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想得太伟大，以至于对生命悲观失望。人生，也不可能不做一点儿事儿。有了一点成绩，大的，或小的，也不要对自己的那点事儿太当一回事儿，以至于飘起来，连日常说话都用显示身份的语气，透着满肚子学问。平常人，用平常心，过平常日子，多好。

也是从住在爪哇堂起，我开始了“对广东的阅读”和“在广东的阅读”。我对广东作了不少阅读：广东文学、广东文化等等。读了，有时便写下一些感受。有人说，广东人，本来就爱关起门来自夸，你从北京来，何必助长这种“传统”？我有时笑笑，有时作些解释。我想，干我们这行的，

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夸一下什么或批一下什么，而是要说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谈广东、或是谈北京，谈一部作品、或是谈一个文学现象，都只是一个谈论对象，并不是我们的谈论目的。目的是要通过谈论对象来谈谈我们想谈论的问题。对象是材料，问题才是题旨。我对广东的阅读，其实只是我“在广东的阅读”的一部分，目的是要读中国。对我来说，广东的许多新的文学、文化现象，是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反叛。我不否认我对广东文学与文化进行了一些精神性的挖掘，但我要谈论的恰恰是中国，是中国文化的重构之种种。

在这些谈论中，我不否认欲望。第一，我不认为欲望只是物欲、肉欲，精神需求同样是人的欲望。第二，我以为，建在高空的“精神”再伟岸，都无济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重构。把“欲望”抽空了的精神还是不是真正的“精神”，是需要讨论的。只有正视人的欲望，利用欲望系统的张力，才能真正找到新时代文化的生长点，为个体建立精神家园，为社会建立精神秩序。

面对欲望的过程，对中国人来说，是一个阵痛的过程。阵痛总要付出些代价。这个代价对我们这些从事人文工作的文人来说可能更明显。既然历史无法回避，你就得认了。我也常常嘲笑自己，一介穷书生，却不乏“崇高”情怀。自己的生计未必很如意，却想着为民族未来承担阵痛，并麻起胆子想中国文化重构的生长点。

情怀崇高不崇高且不管它，自己是一介书生却是记得的。书生就是书生，就是读书、写字。这读书、写字你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高，只是你的一种生存方式。对你的这个生存方式，你得有点平常心，犯不着为自己规定，一定要怎么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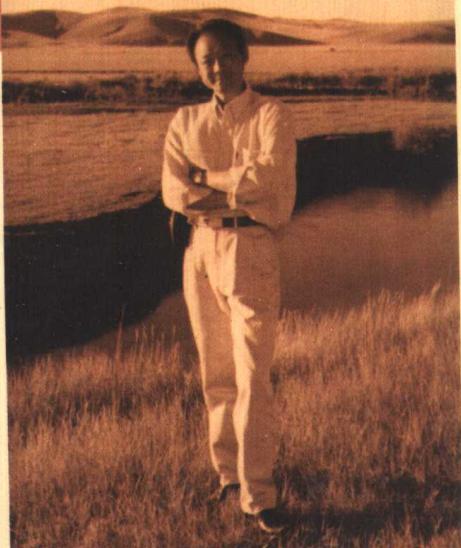
自序

怎么样；犯不着为没能“怎么样怎么样”就沮丧；也犯不着为社会和他人规定，一定要对我的东西怎么看怎么看；更犯不着为社会和他人没有对你的东西“怎么看怎么看”时就生气。我喜欢魏晋时期的文人——这话说起来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，那种生存境界我达不到。当然，达不到归达不到，私下里喜欢还是可以的。我读书写作，只想证明作为一个文人的我，活着，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显示，我是一个活着的“文人”。因而近几年也养成了一点怪毛病：不喜欢赶热点。我不会为别人的思考改变我思考的轨道。我只读我喜欢的书，想我关心的问题，说我想说的话。我关心的问题，有可能成为热点，大热或小热，也可能一辈子热不起来。这都不重要——热了，我没有必要回避；不热，我没有必要追求。重要的是，我想过，说过。这就够了。

于是便有了这本书。

作者简介

程文超，1955年2月出生于武汉，很快便投入大别山的怀抱。山的精灵曾孕育过大孕中表过了我的“作家”梦。高发诗，是高中毕业后的知识青年，是中业后当了大学招生人员看上，于是在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广阔大的理论天地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忘记了旧梦，走进了新梦，从此便在理论批评这个“梦”里“痴”着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攻读研究生。1987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。1990年因中美联合培养，留学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系。1992年回北京大学撰写毕业论文。此番折腾，用了别人读两个博士的时间，才拿到一个博士学位。1993年7月到中山大学任教。现忝为该校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近年出版的著作有《意义的诱惑》、《寻找一种谈论方式》、《1903：前夜的涌动》、《百年追寻》等。



目 录

第一辑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说一回“后现代” | (2) |
| 走向“现代”之路 | (22) |
| 附录：“人文”与“后学”：世纪之交的碰撞 | (35) |

第二辑 欲望与诗情：我看第三种批评

- | | |
|--|-------|
| 世纪之交的寻找——我看第三种批评 | (44) |
| 欲望的重新叙述 | (51) |
| 走向彼岸后叙事——何继青的小说世界 | (62) |
| 欲海里的诗情守望——我读张欣 | (81) |
| 附录一 欲望与文化重构——寻找当代文学
“第三种声音”讨论之一 | (101) |
| 附录二 此岸诗情的可能性——“寻找第三种
声音”讨论之二 | (119) |

第三辑 叙事的时间与心灵的空间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时间秩序回到叙事之后——谈“现实主义冲击波” | |
| 修复故事的努力 | (134) |
| 品味游子心 | (153) |
| 疏离与叙事：广东文学创作之我见 | (161) |

曲与直、今与昔：90年代的影视诉说 (166)

第四辑 寻找新的文化支点

女性写作的多种可能性.....	(187)
南国有风铃.....	(203)
雅俗之间.....	(210)
实话实说：匮乏的丰富及其他.....	(221)
修辞、支点、诗与成熟——广东理论写作三题.....	(231)
寻找新的文化支点——新时期文学思潮管窥.....	(242)
后记.....	(261)

第一辑

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

说一回“后现代”

“后现代”这一概念已经混乱得几乎不能言说了。

然而，对“不能言说”的东西有时还不得不说。说，并不一定对别人有益，却实实在在对自己有用。因为“说”，并不能就解决“混乱”——天知道会不会增加混乱！但“说”却可以帮助理清自己心中的“乱”。

不得不说的时候，就说一回。^①

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

后现代的性质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。麦克黑尔曾提出这样的疑问：关于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是否存在一致的观点？显然，他认为，甚至连是否该使用这个术语，意见都不一致。这是实情。所以我想我们谈后现代主义的性质时，最好不要斩钉截铁。我们只能说我所认同或我所认为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。

我对利奥塔的说法较感兴趣。利奥塔在《后现代状态：关于知识的报告》里将后现代定义为“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”。我愿意将“元叙事”理解为启蒙理性的叙事，

理解为现代性的叙事。因为启蒙理性将自己的叙事解释为关于终极真理的叙事，是元叙事。在我看来，后现代是对启蒙理性的反思，对现代性的叛逃。这一点，佛克马在《走向后现代主义》一书中有过明确的表述，佛克马认为，后现代主义世界观是长期的世俗化和非人化过程的产物。他说，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条件，而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，从科学到哲学，这一观念愈来愈难以自圆其说，以致终于站不住脚，变得荒唐可笑。

谈后现代的性质必然涉及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。这在谈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那里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。奥尔森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，标志着一种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精英意识的彻底决裂。这一说法凸现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，却又遮蔽了他们之间的联系。我认为，理解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联系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。如果完全把现代主义当成后现代主义的敌人，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性质。其实，对启蒙理性的反叛，对现代性的叛逃早在现代主义就已经开始了，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独创。在这一点上，它们是一致的。只是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为激进。在日益破碎的世界面前，后现代主义不满意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和姿态，他们从现代主义的腹部崛起并对其进行颠覆。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贰臣逆子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，无论是结构主义的“结构”，还是海德格尔们的“存在”，都没有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。后现代主义不承认一个由“中心”赋予真理与意义的完整的世界的存在。这一点王尔德的表述比较好。王尔德说，在现代主义那里，世界是一个需要修补的世界，而在后现代主义

那里，世界是一个无法修补的世界。照我的理解，这里的“世界”当然不应指“客观”存在的世界，而应指由启蒙理性话语建构的世界。

对后现代主义特征，哈桑曾有过著名的表述。说得很多，也很琐碎。要我说，一言以蔽之，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“解构”。所谓“不确定性”、“零散性”、“无深度性”、“不可表现性”、“非原则性”等等都与解构密切相关。解构，是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言说者们的一个共同拥有，它使后现代主义区别于现代主义与其他种种主义。它也将会成为后起的种种话语所针对的一个目标。

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及含义

这里有三个相关的问题。

第一，中国是否进入了后现代社会？某些后现代的言说者在这一问题上含糊其词。一些后现代的反对者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强有力的理由。我想可以毫不含糊地说，中国远远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。岂止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，中国还有很多很不“现代”的东西。

第二，中国是否“发生”了后现代？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含糊地作出肯定的回答。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并不等于没有“发生”后现代。在今天的中国，从生活方式到生活态度，从人生到艺术，不难看到后现代的幽灵。后现代在中国的“发生”，是中国“文革”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和20世纪世界文化的大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。首先是“文革”因素。“文革”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影响，也许在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出来。“文革”

后，对一切价值重估，使人们天然地容易接近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思考。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，当时思想文化界被人道主义燃烧着。80年代末，人道主义思想幻灭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生便是可以理解的了。其次，80年代以后，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商品经济阶段，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。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格局。杰姆逊认为，后现代主义是与商业化联在一起的。商品生产带来了统一价值观的破碎，带来了大众文化的繁盛，带来了无深度的精神消费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信息事业的繁荣。电脑联网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。并不发达的中国商品社会消费着发达商品社会的精神资源。用简单进化论的观念作依据，认为只有现代主义充分发展了之后，才能走向后现代，看来不能解释今天的文化现象。当然，中国后现代的发生还因为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传播和影响。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与中国人对“文革”的思考结合在一起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态度又正解释着商品经济下中国人新的生活方式。总之，后现代在中国的“发生”是不可避免的。

第三，在阐释的维度上，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于中国的关系。在一个并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中国，能否借用后现代主义理论？回答是肯定的。既使中国完全没有“发生”后现代，也不是拒绝后现代主义的理由。上个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中国社会根本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——至今咱们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已开始介绍社会主义理论，运用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。事实证明，它是充分有效的。况且，中国已经发生了后现代主义。中国当今的某些文学、文化现象确实

需要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它进行解释，我们不能回避。

同时，在“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于中国的关系”上，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需要注意：后现代主义理论究竟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有效？我们不能把后现代在中国的“发生”扩大化，也不能把后现代理论在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普遍化。以为后现代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的一切现象，只能是痴人说梦，我将它称之为“后现代梦呓”。

后现代与现代性及中国的现代化

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一项并未完成的工程，它还没有走向终结。如果说对西方现代性的分析，理论家们分歧较大的话，在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形：对中国现代性现状的分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歧义。似乎还不能用“完成”、“终结”这些字眼去谈论中国的现代性——它不是离“终端”更近，而是离“开端”更近。它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程。

毋庸讳言，中国的现代化正在推进着中国的现代性工程。从科学到科学观、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，现代性正在紧张的建设之中。如果有谁因为要对“现代性”反思，而去反对或阻碍中国当下的现代化，那这人不是疯子便是呆子。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会正视这样一个现实：中国需要现代化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中国当下紧迫的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。在这个问题上谈论后现代性就有可能与前现代合流。

那么是否因为中国正在建设现代化，我们便不能对“现代性”进行反思？是否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正在推进之

中，我们便拒斥后现代性？在我看来，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后现代的言说同时是必需的，至少有两点理由。

第一，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远不是英美当年的现代化建设，它处于20世纪的世界语境之中。中国在推进现代性的同时，也“发生”了后现代。

第二，今天已经不是对现代性盲目推崇的时代。我们既能看到现代性在今天中国的必需，又能看到现代性的误区与陷阱。既然明明知道了误区与陷阱，便没有必要一直走进去了才开始反思。我们要提醒人们既看到现代性的必需，又看到现代性的误区。一方面推进，一方面消除它的毒副作用。后现代性正是现代性的解毒剂。以工业建设为例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必然要带来对大自然的损害，破坏生态平衡、排出有害的废水废气等等。以前的人们不知道生态平衡的道理，把对大自然的损害当成征服大自然的战果，把烟囱里的黑烟当成美丽的图画歌颂。今天我们却可以在工业开发的同时，减少对生态平衡的破坏，减少烟囱里的黑烟。在精神文化领域更是这样。

在强调需要后现代理论的同时我们还要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设限。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后现代理论在今天中国的功能：对某些现象的阐释功能和对现代性的解毒功能。在这些功能之内，它是有效的。超出了一定的范围，它的有效性便要受到怀疑。今天中国人文工作者面临的任务是寻找能阐释中国复杂现实的理论，只认定某种单一的话语显然不能阐释中国，也不是理论工作者应有的态度。对今天中国的后现代言说者来说，确实在警惕的是后现代的独断。把一切都言说为后现代；只允许后现代的言说，这种“后现代梦呓”本身便没有后现代性。